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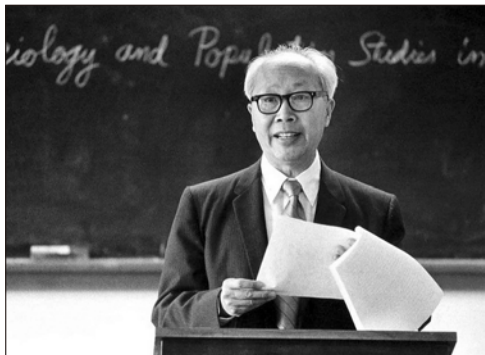
著名学者赵宝煦去世

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系主任赵宝煦教授，2012年1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著名学者刘军宁曾经在赵宝煦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直言，赵宝煦是北大精神的化身和体现，他把北大传统精神提升到新的高度，同中国文化传统和为贵、中庸之道结合起来，从而展现出这样一种兼容并包、和为贵的学术精神和道德精神。赵宝煦的另外一个高足俞可平教授认为，赵宝煦身上有传统道德的回归以及对传统的弘扬和恪守，他把好的道德、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又善于吸收时代的新思想新知识，做到了两者的很好结合。

世人不禁好奇，一介书生赵宝煦为何能够得到体制内外的学者一致的认可？纵览赵宝煦一生，会发现其人生基本上是三部曲，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求学，是铸造辉煌底色的时期，中年时期在反右、“文革”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惊天风雨中备受折磨，晚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在郭沫若所言的科学家的春天里重新起航，为中国政治学的复兴筚路蓝缕，呕心沥血。

1943年1月21日清晨，不知旧中国还有共产党的“伪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一年级学生赵宝煦，悄悄踏上逃离沦陷区北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万里征程。他和3个同学由京浦线转陇海线，由长途汽车改乘木板车，跨过一道道日伪封锁线，经徐州、商丘、亳州进入国统区界首的一片旷野荒郊。在界首找不到接待沦陷区学生



1982年，赵宝煦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讲学

的单位，赵宝煦一行囊中羞涩，困在小店里。危难之际，赵宝煦等接受了国民党西安“抗战干部训练团”的招募。他们徒步13天抵达洛阳，又挤上难民车走走停停来到西安。

赵宝煦进入“战干团”后遇到了种种荒唐的事情，又在青年会的军人服务部听北平来的同学不断说军官克扣军饷、“代管”家里寄来钱等怪事，遂毅然逃离西安，辗转奔赴成都、重庆，为生计沿途干过工厂绘图员、家庭教师，还当过国军营部的中士秘书。后来，赵宝煦参加教育部“保送考试”后舍近求远，选择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这时，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动找上门来，动员他加入该组织，许诺不仅提供路费，而且入学后每月还有津贴。赵宝煦一路风尘，对国民党早有认识，宁肯滞留陪都也不肯出卖自由，困顿重庆51天，最后经人照顾才爬上敞篷大货车，颠簸16天来到昆明。从“伪北大”到西南联大，赵宝煦走了9个月零10天。此

时，联大新生注册工作已全部结束，他不得已直接给主持校务的梅贻琦校长写信，痛陈“生万里来归，如不能注册，则生活无着，必将流落街头……”

同何兆武、许渊冲等西南联大毕业生一样，赵宝煦在其后苦难而曲折的一生中，也总是每每依靠回首联大的光辉岁月来获取精神上的养分，这一块虽然贫穷却民主、自由的土壤，滋养着他的心灵世界。赵宝煦进入西南联大化工系就读。一年后转入政治学系，师从张奚若、钱端升等老一辈著名政治学家。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校，赵宝煦遂回到北大政治系继续学业，1948年毕业并留在政治系任教。北京大学吴志攀的父亲与赵宝煦是生前好友，也正因此，年长一辈的追忆往事，便融化成他的笔触中赵宝煦在西南联大学生时期的细节与场景。

吴志攀在纪念专文里叙述了这一段被遮蔽在历史长河中的往事，“我和父亲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赵先生是西南联大政治系的，抗战后复员，留在了北大，我父亲是联大社会学系的，后来从清华毕业参加革命。在联大时，他俩都爱好文艺，一起参加过‘阳光美术社’。赵先生比我父亲两岁，父亲对这位学长非常尊重，曾经多次对我说，赵先生在联大校园里就是有名的大才子，书念得好，既能写旧诗，又能写新诗，书画造诣都高。他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然成家比较早，但还是跟大男孩一样，经常和大家一起玩。当时联大学生办了‘阳光美术社’，经常请闻一多先生讲课。因闻一多先生不仅是大诗人、大学问家，还精于篆刻。此外，叶浅予先生

有一位远房亲戚也是该社的成员，所以叶先生跟他们联系也比较多。当时，赵先生和我父亲他们业余学画，并不太追求技巧，而更加注重思想内涵。闻一多先生的政治态度，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这个美术社里的很多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多年后，我父亲和他的同乡、挚友、杜诗专家廖仲安先生一起，还写过一部关于闻一多先生的剧本，可惜现在湮没无闻了。”

这段学生时期的经历在赵宝煦的学术生命中不断地回放，并且激荡起隔离时空的回响。2001年12月5日，中国政治学会在温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赵宝煦在会上提及1932年就在南京成立了最早的中国政治学会，并分别在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召开过三届年会，至1946年，拥有会员140人。当时积极发起建立或参与活动的中国政治学会的老一代政治学家有王世杰、钱端升、浦薛凤、周鲠生、萧公权、张汇文、张奚若、钱昌照、许德珩等。很多年青一代的与会者几乎是第一次听说上述陌生而遥远的姓名。动荡年代的时代风潮，就这样残忍地将他们从历史中几乎完全消音了。

“文革”时期的赵宝煦是一个勇者，他并没有完全退隐回内心的城堡做一个犬儒主义者，更不是主动迎合权力者的需要做一个用知识来献媚的无骨者。赵宝煦曾回忆说：“聂元梓长得不漂亮却追求时髦，‘文革’前穿着白皮黑尖的港式皮鞋，这在当时十分罕见。”一向温良恭俭让的赵宝煦决定向聂元梓叫板。1968年7月28日，赵宝煦张贴了《聂元梓反动的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质问北大造反派总头目：“中央明确规定‘没民愤、没政治历

□ 怀念师友

史问题、没被报纸点名批评’的应该解放，我3个条件都符合，你为什么迟迟不解放我？”这件事震惊了北大，也惊动了中央“文革”。8天后，江青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说到“老保翻天”时公开点了赵宝煦的大名。从此，每每批斗陆平、彭珮云和季羨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时，赵宝煦必陪伴左右，受尽了皮肉之苦、羞辱折磨。

晚年赵宝煦追忆这一段往事，认为这种政治勇气若要追根溯源的话，要追溯到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给我的东西，就是自由、民主思想。我认为，不管你是中国民主还是美国民主，必须权力不能集中于一身，权力必须有人监督。权力集中于一身，人会变的，多民主的人也不行。大家都坐在这儿，我们每个人都给你鼓掌，我对你没有坏意，可是我不鼓掌，你就对我有一种看法。”这里没有什么高深理论，却道出政治学最基本的常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因此权力应该相互制衡。

“文革”结束后，赵宝煦人生中的第二个真正的春天才来到。他在北大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点，1985年起正式招生，3年后培养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国内的政治学博士。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曾在赵宝煦的诞辰纪念会上致辞，基本总结了赵宝煦的一生：“赵宝煦先生65年如一日，始终根植北大这片沃土，毫无保留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极其旺盛的研究活力，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开拓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回看赵先

生的治学施教历程，我们要衷心感谢他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那立志把毕生心血献给祖国的爱国情怀，他那利用一切机会为新中国政治学奔走的国际视野，他那永不懈怠始终追逐学术尖端的创新意识，他那甘为人梯培养新人的坦荡心胸，他那恬淡质朴执著率真的人生态度，都集中展示了老一辈北大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魅力。”这些话让人们深刻了解到这位堪称兼具经师和人师风范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赵宝煦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这样从历史的眼光和个人的体验，来谈及他对百年中国政治学和百年中国史的感受：

“我觉得中国政治学的百年进程，就不能离开它的背景。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欺负的国家，我从自己说，我是从小在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里成长起来的。而且说到中国人一盘散沙，不能团结，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对我有影响，对政治家也有影响。可是，到了我们现在在国际上说话有一点点发言权了，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够揪住老不放。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但是我要往前走。我往前走，就是要科学地发展。我觉得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从国难国耻的愁云惨雾中走向科学的发展观。你这发展，我总得给子孙后代留点活路吧，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给用完了吧。而且，我不能够说为了当时一件事情，特别集中一点，说到人权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知情权。不能像现在似的，都糊弄了。”

这是一位智者给我们这个不无喧闹的时代留下的临别赠言。

原载《东方早报》2012年2月10日，作者田波澜